



台湾研究新跨越·经济分析

总主编

刘国深

副总主编

邓孔昭

邓利娟

主编

石正方

九州出版社

总主编 刘国深 副总主编 邓孔昭 邓利娟

台湾研究新跨越 经济分析

主编 石正方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研究新跨越·经济分析/石正方主编.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5108-0446-5

I. ①台… II. ①石… III. ①台湾问题—文集②地区
经济—经济发展—台湾省—文集 IV. ①D618-53②F127.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8292 号

台湾研究新跨越·经济分析

作 者 石正方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8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446-5
定 价 5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台湾研究所）成立 30 年来，我们先后在 10 周年庆典、20 周年庆典和 25 周年庆典前出版了《台湾研究十年》、《台湾研究论文集》和《台湾研究 25 年精粹》，这次又集结出版了“台湾研究新跨越”系列文集，作为 30 周年庆典的献礼。本系列文集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继续传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团队精神，将过去 5 年来较具学术创见的研究成果汇总起来，进行集中展示，以便于关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发展的领导、学界同仁在短时期内了解本院五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前沿；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有一个新的开始，激励全体师生在台湾研究的学术征程中确立新坐标，找到跨越研究难题新的着力点和方向。

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优势。2006 年 12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一行前来视察，在向他做简报时，我谈到了自己在研究中的一点感想：“对于我们这些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来说，如果不知道台湾的历史，我们的研究是不会有深度的；如果不知道台湾的文学，我们的研究是缺少人文关怀的；如果不知道台湾的经济，我们的研究是不能说有深度的；如果不知道台湾的政治，我们的研究是很难有高度的。”这段话是个人在对台交流交往和研究工作中比较强烈的感受，对于任何研究者来说，要跨越这么多学科去认识台湾问题实属不易，但是，不跨越学科藩篱又不行！

1895 年清政府被迫割让台湾，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变法图强的坚定意志。115 年以来，两岸中国人为此不懈努力，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也走了许多弯路。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和教训，其中知识的偏颇和缺乏系统性的思维可能是值得检讨的众多问题之一。作为政治精英个

体，两岸的许多前辈先贤，他们各自都有对国家和民族问题极其深刻的洞察和体会，他们提出的主张也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如何吸纳其他人的观点，如何采纳其他政党的合理主张方面，我们太需要够调和鼎鼐、博采众长的精英。学会欣赏对方的优点，真正做到有容乃大，其实并非易事，除了要有高尚的道德精神外，更需要有全面的知识和能力。这一点对于从事台湾研究的专家学者来说同样是适用的，当我们的国家拥有一大批知识渊博且胸怀宽广的两岸关系研究精英群体时，我们就有可能实现 115 年来的梦想。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30 位研究人员，分别隶属 5 个研究所和政治、经济、历史、文学、法律、教育 6 个不同学科。虽然平时有不少机会一起工作和生活，但跨学科知识整合和合作研究的机会仍然很有限。期待这一系列文集的出版，将再触动全体师生研究观念的变革和跨越，或许 5 年、10 年之后，多学科的知识整合将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收获和喜悦。

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人，感谢全院教职工不懈的努力和奉献！

刘国深

2010 年 5 月 8 日于厦大海滨寓所

目 录

第一篇 台湾经济及政治研究

试析台湾“均富型增长模式”的改变	邓利娟 (3)
台湾经济“四化”问题与两岸经济合作	石正方 (20)
台湾经济现状与前景分析	邓利娟 (32)
现阶段台湾贸易政策及其影响评析	邓利娟 熊俊莉 (44)
台湾经济发展规律研究	李 非 胡少东 (57)
台湾经济从“奇迹”到“困境”发展过程的重新审视 ——基于东亚新学说的理论视角	邓利娟 (69)
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台湾经济形势分析	李 非 吴凤娇 (86)

第二篇 两岸投资、贸易及经济关系研究

台湾企业集团大陆投资现况与策略研究	石正方 (103)
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与两岸贸易间的动态关系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王 华 (118)
在厦台资企业对厦门投资 环境评价的调查分析	王 华 石正方 (129)
台商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的最新考证	王 华 (141)
台湾农产品贸易的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浅析	赵玉榕 (155)
两岸经济相互依存性发展态势的定量考察	唐永红 (165)
闽台经贸交流回顾与展望 ——基于区位优势变迁视角的分析	石正方 (181)

第三篇 两岸产业合作研究

厦台农业交流的可行性与合作领域探讨·····	赵玉榕	(197)
台湾渔业的困境与出路·····	赵玉榕	(204)
台湾渔业产能与两岸整合·····	赵玉榕	(211)
论台湾农业科技创新及其启示·····	赵玉榕	(226)
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的分工与合作·····	李 非 熊俊莉	(235)
台湾现代服务业发展及大陆引资策略研究·····	王 华 陈 茜	(252)
论海峡两岸物流产业的合作发展·····	李 非 刘严毅	(263)
闽台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对接途径与模式研究·····	赵玉榕	(277)

第四篇 两岸经济一体化与区域整合

当前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可行性考察·····	唐永红	(295)
政治关系僵局下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实现路径探讨·····	唐永红	(309)
构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区		
进一步发挥海峡西岸对台优势与作用·····	唐永红	(325)
关于构建厦金特区问题的探讨·····	唐永红	(343)
厦泉漳城市联盟发展的意义及取向探析·····	石正方	(360)
海峡经济区的空间演进：结构、特征与问题·····	石正方 邓利娟	(371)
“海峡旅游区”的构建及		
其对台湾旅游业的影响·····	邓利娟 黄智略	(384)
海峡经济区竞争性区域体系构建研究·····	王 勇	(399)

第五篇 大陆涉台经济研究历程与方法回顾

海峡两岸经济关系研究 30 年回顾与启示·····	李 非 曾文利	(415)
30 年来涉台经济研究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演进		
——基于历年《台湾研究集刊》所发表论文的分类分析·····	王 华	(429)

第一篇 台湾经济及政治研究

试析台湾“均富型增长模式”的改变^{*}

邓利娟

各国各地区发展经济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国民收入，改善生活水平。但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往往趋于集中，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正因为如此，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战后台湾“均富型增长模式”（经济发展同时带来社会平等）曾备受世人称道，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这种模式发生了明显的逆转趋势，而进入21世纪以后，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更是成为台湾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因此，台湾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当代台湾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对于收入分配理论也具有明显的研究价值。本文首先阐述相关收入分配理论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追寻台湾经济增长与所得分配之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探讨其“均富型增长模式”发生改变的原因。

一、有关收入分配理论的历史演进

自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 Kuznets）就经济增长中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曲线”假说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一假说，发展经济学家们学术争论不断，有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也在此过程中向前推进着。

^{*} 本文原载于《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中普泊茨江讲	止地由	上丁公局上同定始上地亚地北上上亚地北上
中普泊茨江讲	止地由	上丁公局上同定始上地亚地北上上亚地北上
中普泊茨江讲	止地由	上丁公局上同定始上地亚地北上上亚地北上

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比在发达国家更加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可能继续扩大。

在 1960-1970 年经济增长高速增长期已告结束。

世界银行在 1990 年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在 1980 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

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体制能够通过政府政策上的操作而有所改变。

的 20、30 年里，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台湾等地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在理论研究方面，从 80 年代开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通过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资料分析，对“倒 U 型曲线”提出了公开质疑。到了 90 年代，则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对此假说提出不同意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98 年 Deininger - Squire 在其出版的《国际不平等数据库》中，运用 108 个国家的有关数据资料分析表明，“大约 90% 的被调查国家是不存在倒 U 型曲线这种关系。”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不平等在经济增长时期会上升，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同样会上升。^①

同样，赖特（C. L. Wright）的制度假设理论也对库兹涅茨的假说提出了挑战。^②他认为，市场力量不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唯一因素，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机制和政府的政策。如果过度关注市场力量而忽视机制变迁和政府政策，便会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认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像“倒 U 型曲线”理论所假设的那么多变，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都必须经历如“倒 U 型曲线”假设所描述的这种单一模式。此外，机制变迁和政府政策也有可能继续导致收入不公的恶化。而且，这种情况不可能得到“自我纠正”。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的国家尤为如此，因为控制政治和行政权力的精英是不会贯彻那些

① 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② Wright, C. 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xamining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13, October, p. 51, 62, 63. 转引自沈红芳：《东亚主要经济体收入分配的比较研究》，《南洋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17-18 页。

中普泊茨江讲	止地由	上丁必层上同定始上地亚地北上上亚地必讲
中普泊茨江讲	止地由	上丁必层上同定始上地亚地北上上亚地必讲
中普泊茨江讲	止地由	上丁必层上同定始上地亚地北上上亚地必讲

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比在发达国家更加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可能继续扩大。

在 1960-1970 年经济增长高速增长期已告结束。

世界银行在 1990 年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在 1980 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

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体制能够通过政府政策上的操作来有效地区别对待不同的地区。

的 20、30 年里，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台湾等地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在理论研究方面，从 80 年代开始，一些发展经济学家通过观察发展中国家的有关资料分析，对“倒 U 型曲线”提出了公开质疑。到了 90 年代，则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对此假说提出不同意见。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98 年 Deininger - Squire 在其出版的《国际不平等数据库》中，运用 108 个国家的有关数据资料分析表明，“大约 90% 的被调查国家是不存在倒 U 型曲线这种关系。”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不平等在经济增长时期会上升，同时在经济衰退时期也同样会上升。^①

同样，赖特（C. L. Wright）的制度假设理论也对库兹涅茨的假说提出了挑战。^②他认为，市场力量不是决定收入分配的唯一因素，决定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因素是机制和政府的政策。如果过度关注市场力量而忽视机制变迁和政府政策，便会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认识。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像“倒 U 型曲线”理论所假设的那么多变，事实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都必须经历如“倒 U 型曲线”假设所描述的这种单一模式。此外，机制变迁和政府政策也有可能继续导致收入不公的恶化。而且，这种情况不可能得到“自我纠正”。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的国家尤为如此，因为控制政治和行政权力的精英是不会贯彻那些

① 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② Wright, C 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xamining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13, October, p 51, 62, 63. 转引自沈红芳：《东亚主要经济体收入分配的比较研究》，《南洋研究》，2004 年第 3 期，第 17-18 页。

对其利益有所损害的政策。

如果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互关系不一定呈“倒U型曲线”，就有可能存在即使经济增长，又令收入差距不会扩大的途径。1990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据此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只要采取了恰当的政策，增长可以减少贫困，增长甚至可以和平等的分配携手并进。

（三）重新重视“倒U型曲线”假说

20世纪末以来，有关收入分配理论的学术争论又有了新的发展。1997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奇迹”受到质疑。而拉美各国借鉴东亚的经验所采取的相关改革措施成效不彰，2000年底阿根廷还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主流观点又倾向回到“倒U型曲线”假说上，东亚曾经取得的成绩被认为是由于某些因素在起作用，它们抵消了拉大收入差距的力量。经济学家们在东亚成功与失败间寻找着共同起作用的因素，其中“教育论”较引人注目。英国发展研究所（IDS）的Adrian Wood提出了一种模型，^①其中包括三种类型的劳动力，分别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受过基本教育的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假设一国要发展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产业，至少需要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力。这种制成品产业的扩大将会增加这一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收益，这一方面缩小了他们与高等教育接受者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却扩大了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最终的净影响如何，取决于这三种类型劳动力在人口中的分布。如果一国中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比重非常大，他们所获得的收益的增加就会降低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而如果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的比例非常大，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起的经济增长就一定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东亚国家由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关系，社会整体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因此受过初级教育的人口比重很大，这就为它们通过出口替代战略发展经济并为缩小收入差距创造了条件。但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整体提高，产业结构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时，受益最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① 刘晓路：《论政府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中的作用》，《财贸经济》，2003年第8期。

劳动人口，他们与没有受过教育的和仅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人口间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拉大了。换言之，东亚国家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一种发展初期的优势，但当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倒U型曲线”还是会发生作用的。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的大部分国家均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有关解释比较形成共识的是与“教育论”有关的“知识经济论”。一般认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会使收入差距扩大加快，李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在《知识经济大趋势》中指出：“知识经济使贫富不均变本加厉”。之所以如此，李诚教授指出，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谁掌握最新知识谁便掌握经济大权，而知识的取得只限于少数进入高等学府，特别是名校的学生。^① 韦端教授则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知识经济对所得分配的影响，他认为，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传统产业萎缩而知识密集产业快速发展，由此产生高知识、高技能人力与低知识、低技能人力的供需失衡，进而造成结构性失业增加、所得分配恶化，在此过程中，“高学历高所得，低学历求职难”的趋势更加剧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②

由上述可见，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在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不断加深，尽管目前尚未有十分一致的结论，但相关理论论述对于观察与分析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每个阶段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只是要避免简单、僵化地套用某种理论，因为各个国家及地区发展中的差异性很大，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另一方面，通过对个别国家及地区实际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分析研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检验上述理论的适用性，推动相关理论研究的完善。

① 李诚：《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政策》，台湾“政策基金研究会”，2001年4月14日，www.npf.org.tw。

② 韦端：《知识经济对失业与所得分配之影响》，台湾《“自由中国”之工业》2002年第12期。

二、台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发展轨迹

追寻半个多世纪来台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其经历了由相对较均衡到不均衡的过程，中间呈明显的三个阶段，目前贫富差距扩大化问题对台湾社会的困扰日益加重。以下将采用经济学界常用的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两个指标：其一，高低收入比率。将家庭收入（或个人收入）从多到少进行排列，分成5个组别（或10个组别），20%最高所得家庭的收入与20%最低所得家庭收入的比即是高低收入比率，它衡量的是一个国家及地区最富和最穷两个极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其二，基尼系数。这是20世纪初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Corrado Gini）发明的，系数值介于0与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反之差距越小，国际上一般以基尼系数0.4为警戒线。

第一阶段1953-1980：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的例外。

国民党政权败退至台后，台湾经济经过几年的恢复稳定，从1953年起进入较顺利发展时期，60年代后更进入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1951-1960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6%，1961-1970年增长率达10%，1971-1980年则为9.4%，与此同时，台湾由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社会。在这过程中，台湾的收入分配没有出现“倒U型曲线”假说所描述的不平等扩大的情况，所得分配表现出相对平均化的趋势。1953年，台湾的5组别高低收入比率是16.52倍，所得分配情况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差别不大。但1959年这个比率降为8.72倍，1964年又降到5.33倍，到1972年为4.99倍，1980年进一步降至4.17倍。（参见表1）同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也呈逐步下降，由50年代初的0.5580逐步下降到1980年的0.277。（参见表1）这与5组别高低收入比率趋势基本相同。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基本兼顾了“均”与“富”两个目标，即所谓“均富型的增长模式”，明显是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的例外。

第二阶段 1981 - 2000 年：呈现正 U 曲线走势。

进入 80 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 1981 - 1990 年，年平均增长率仍达 8.1%，1991 - 2000 年平均增长率降为 6.3%。而过去近 30 年的“均富型的增长模式”却发生了逆转趋势，从 1981 年起所得分配差距逐步扩大，5 组别高低收入比率由 1980 年的 4.17 倍上升为 4.21 倍，此后持续上升到 1990 年的 5.18 倍，2000 年时进一步提高至 5.55 倍。同期，基尼系数也相应逐步上升，由 1981 年的 0.281 上升到 1990 年的 0.312，2000 年为 0.326。（参见表 1）与上个阶段台湾收入差距变动走势合并观察，台湾收入差距在这个阶段形成了“正 U 型”变动趋势。（参见图 1）

第三阶段 2001 - 2003 年：贫富差距扩大明显加快并呈“均贫”现象。

21 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增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2001 年出现半个世纪来首次的负增长 2.22%，2002 年增长率回升到 3.94%，2003 年又降至 3.33%。在此过程中，台湾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发展又有了新变化。一方面，所得分配不平均加剧，“正 U 型”的右边曲线明显上升，（参见图 1）5 组别高低收入比率由上个世纪 90 年代的 5 倍多骤然突破 6 倍，2001 年达 6.39 倍，为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最高水平，2002 年有所下降，仍为 6.16 倍，2003 年为 6.07 倍。2001 - 2003 年基尼系数分别为 0.350、0.345 及 0.343。（参见表 1、图 2）另一方面，所得分配情况呈现“均贫”现象，贫穷扩大化趋势明显。由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衰退，全体可支配所得与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几乎停滞不前或呈下降走势。2000 年全体可支配所得 58734 亿元新台币，2001 年下降为 58468 亿元，到 2003 年才缓慢回升到 61377 亿元。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缩水更明显，2000 年为 891445 元，2001 年下降为 868651 元，2003 年回升到 881662 元，仍低于 2000 年的水平。而就户数 5 组别的可支配所得来看，2000 - 2003 年，除了最高所得第 5 组由 1748633 元逐年上升至 1799992 元外，其他 4 组均呈下降走势，其中，最低所得第 1 组由 315172 元下降至 296297 元。^①“均贫”现象发展的结果使全家平均收入低于当局规定的最低生活费的低收入户户数及人数明显上升。低收入户数由 2000 年的 6.65 万户增至 2003 年的 7.64 万户，

①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台湾地区家庭收支调查报告 2003 年》。

2004 年更高达 8.28 万户。低收入户人数也由 2000 年的 15.61 万人增至 2003 年的 18.79 万人, 2004 年再增加到 20.42 万人。^①

表 1 1953 - 1980 年户数 5 组别的所得分配比与所得差距

年 别	可支配所得按户数 5 组别的所得分配比 (%)					第 5 组为 第 1 组的倍 数 (倍)	基尼 系数
	1 (最低所得组)	2	3	4	5 (最高所得组)		
1953	-	-	-	-	-	16.52	0.558
1959	-	-	-	-	-	8.72	0.44
1964	7.71	12.57	16.62	22.03	41.07	5.33	0.321
1968	7.84	12.22	16.25	22.32	41.37	5.28	0.326
1970	8.44	13.27	17.09	22.51	38.69	4.58	0.294
1972	8.6	13.25	17.06	22.48	38.61	4.49	0.291
1974	8.84	13.49	16.99	22.05	38.63	4.37	0.287
1976	8.91	13.64	17.48	22.71	37.26	4.18	0.280
1978	8.89	13.71	17.53	22.7	37.17	4.18	0.287
1980	8.82	13.9	17.7	22.78	36.80	4.17	0.277
1981	8.8	13.76	17.62	22.78	37.04	4.21	0.281
1982	8.69	13.8	17.56	22.68	37.27	4.29	0.283
1984	8.49	13.69	17.62	22.84	37.36	4.40	0.287
1986	8.3	13.51	17.38	22.65	38.16	4.60	0.296
1988	7.89	13.43	17.55	22.88	38.25	4.85	0.303
1990	7.45	13.22	17.51	23.22	38.60	5.18	0.312
1992	7.37	13.24	17.52	23.21	38.66	5.24	0.312
1994	7.28	12.97	17.41	23.18	39.16	5.38	0.318
1996	7.23	13.00	17.5	23.38	38.89	5.38	0.317
1998	7.12	12.84	17.53	23.24	39.26	5.51	0.324
2000	7.07	12.82	17.47	23.41	39.23	5.55	0.326
2001	6.43	12.08	17.04	23.33	41.11	6.39	0.350
2002	6.67	12.30	16.99	22.95	41.09	6.16	0.345
2003	6.72	12.37	16.91	23.17	40.83	6.07	0.343

注: 第 5 组为第 1 组的倍数为求精确系以第 5 组可支配所得总额除以第 1 组可支配所得总额计算而得; 所得总额包括: 薪资报酬、产业主所得、财产所得及移转所得。

① 台湾“内政部”:《“内政”统计月报》, 2005 年 4 月。